

清代满文篆字的新资料

——长春、呼和浩特、北京三地走访调查记

金毅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满文篆字与蒙古文篆字的关系是满族文字发展史特别是满文篆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目前的资料,新满文篆字表现出的过渡性质,反映满文篆书经历了原发性的演进过程;而早于此的蒙文篆字却没有类似的原始性表现。所以,前者不是借鉴自后者,二者应当是各自创制、分别发展的。调查得到的新资料有助于深化满族文字尤其是满文篆字及其应用的研究。

关键词:满文篆字;蒙文篆字;关系;新资料

中图分类号:H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03)02-0089-04

为了更多地收集有关满文及其篆字应用的资料,全面调查清代玺印制度,深入了解满文篆字与蒙古文篆字之间的关系,笔者于8月1日至20日去长春、呼和浩特、北京三地,趁参加会议之便,走访了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及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单位,在有关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热心支持与大力配合下,顺利完成了调研任务,取得了一些珍贵的新资料,开阔了眼界,深化了认识,广交了朋友,为这一课题今后的研究开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并在此向整个调研过程中一直鼎力相助的老朋友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1. 满文篆字与蒙文篆字的关系问题

满文篆字是在满文楷书笔画多圆滑曲线特征基础上经化点为线、化圈为方、化曲或斜线为直或垂直折线(极个别为斜线)而成的一种方正、整齐、均匀、美观的艺术化字体。其造字根源很可能来自汉代缪篆(或曰摹印篆)的影响,横平竖直的元代国书“蒙古新字”八思巴篆文正是受到方正的缪篆根据圆润的小篆或玉箸篆而成的原理之启迪,以及唐宋以来九叠篆的熏陶濡染,从而在以直线或垂直折线为主而具有曲线、斜线等笔画的正书基础上化曲线、斜线为直线或折线(极少数仍为斜线)制成的。^①这对于后来具有类似变化的满、蒙文篆字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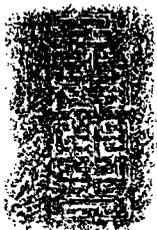
蒙文篆字“牙”、“点”皆作横线,词线写法与楷书一样居中,这些特征与雍正六年八月二日“登色及妻孟氏觉罗氏(双全之父母)诰封碑”近似于上方大篆风格的满文篆字阴额 *hesei fungnehe*^②(“诰封”。见图一)

收稿日期:2003-09-18

作者简介:金毅(1944-),男(满族),辽宁盖州人,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满语语音学、地名学、满族文字学、满族语言史及满汉语言关系史等研究。

① 有关八思巴文篆字研究及资料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 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0年、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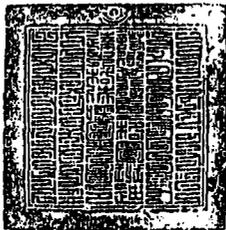
② 为排版方便,本文满文皆用罗马转写字,篆体以斜体相别。



图一 浩封
登色及妻孟氏
觉罗氏浩封碑阴额
雍正六年八月



图二 乾隆



图三 诺们其璧里格
图班迪达大格
布呼图克图印
铁,方7厘米,玉钮



图四 管理镶蓝旗游牧
察哈尔总管之印
铜,方8.4厘米
厚2厘米,直紐

颇相雷同,更与高宗皇帝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上钤印的满文篆字 *abka wehiyehe* (“乾隆”。见图二)^{[1](卷8)} 连珠印风格相一致,蒙、满文篆字关系实在是满族文字发展史特别是满文篆字研究中躲不了、绕不开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占文篆字资料是朝洛蒙先生所著《蒙文篆刻》一书中两度引用的八思巴文^①、汉文和蒙古文三种篆字按左中右序刻成的“诺们其璧里格图班迪达大格佈呼图克图印”(见图三)^{[2](P24、P78)},该资料来源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生导师贾拉森教授,他是阿拉善盟广宗寺(即南寺)寺主,在其所著《缘起南寺》一书中也刊布了这个材料。^{[3](P112)}该印系广宗寺继六世达赖喇嘛罗桑仁钦仓嘉措之后的第二世葛根——罗布桑图布丹嘉木苏被乾隆皇帝授为南寺首任“达格布呼图克图”时所颁发,时间应当在潘代嘉措林寺被清廷赐名“广宗寺”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其作为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757年11岁时被请至新建成的南寺坐床。入藏学经时曾被班禅额尔德尼封为“伊拉古克桑班迪达贡卓诺门汗”。得到上述封印,当是在其人京参加洞礼年班之时。从时间上看,罗布桑图布丹嘉木苏生于1747年4月8日,时值乾隆十二年,距满文篆字完备的年份只差一年;到了他获得封印时,已是满文篆字三十二体详备十余年后的事情了,这期间满文篆字早已广泛应用于清代政治生活,仅于玺印一项,即已用字体十种之多。笔者这次调查收集一方满文篆字与蒙文楷书合璧的“*kubuhe lamun i nuktore bai cahar i gūsa be kadalara uheri da i doron* (“管理镶蓝旗游牧察哈尔总管之印”)^②”(见图四。该印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印文资料,印左侧铸有“乾隆十七年三月日”字样,说明早在乾隆十七年于蒙古地区官印中即已通行满文篆字了。

材料披露,远在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的一份文件《金国蒙古各贝勒致朝鲜国王书》中即已钤有“刻印手法十分规则,同乾隆年间满文篆书规范化后的篆法相似”的两方蒙文篆书印。^[4]朝鲜文献《李朝实录》也载有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致朝鲜国王书中钤有胡书“篆样番字”“后金天命皇帝”字样的“后金汗宝”,^{[5](P3042-3043)}似乎满蒙两种文字很早便出现了篆字。遗憾的是两方蒙文篆书印拓至今未见发表,其具体面貌无从得知。而《李朝实录》所记又未免失于笼统含糊,中有诸多疑窦矛盾,尚难凭信。不过联系到入关前新满文篆字所具有的诸多带有过渡性质的缺欠与不足,充分反映出满文篆书经历了一个原发性的从楷书演进的过程;而在时间上与此先后的两方蒙文篆字印却没有类似的

① 这种“八思巴文”实际上是明清以降借用元代八思巴篆体字来拼写藏文的转写符号系统,据照那斯图先生研究,这种字在形式上很像八思巴字但在字母笔画结构上已部分地脱离了八思巴字相关的约束而自成体系,表现在“字母中有不少八思巴字完全没有的形式,或与八思巴字不尽相同的形式,相反有很多八思巴字已有形式它却不用”(见《一种从八思巴字脱胎而来的文字》,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第58页),故研究者一般称之为“方体藏文”,或“篆体藏文”(见王尧:《藏文》,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第72页)、“八思巴(篆体)藏文”(见松儒布:《介绍两份八思巴字文献》,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为排版方便,此处仅列满文,蒙古文从略。



图五 慧通禅师之印
银,方7.8厘米
云钮,高6.5厘米



图六 皇帝之宝
碧玉,方五寸,厚一寸八分
盘龙钮高三寸



图七 吏部之印
银,方三寸三分
厚九分,直钮三台



图八 琉球国王之印
银镀金,方三寸五分
厚一分,驼钮

原始性表现。这个事实说明,当满文篆字尚处于发展的萌芽阶段时,蒙文篆字已进入到发展的成熟时期。文字的外化特征信息是文字内在“进化”阶渐的客观反映,倘若满文篆字果真借鉴了蒙文篆字而创制,则其原始性无从解释。所以,至少从目前看,满文篆字的产生还不是借鉴蒙文篆字的结果,二者最低限度也应当是各自创制、分别发展的,至于后来参考、借鉴之处容或有之。为了进一步求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走访了著名蒙文篆字专家、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内蒙古书协副主席、内蒙古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朝洛蒙先生。朝洛蒙先生不仅书法、篆刻技艺卓尔不群,且于蒙文篆字深有研究。他认为蒙文篆字的出现是受到了满文篆字的影响。

2. 新收集到的满文及玺印资料

此次调研,收集到了较为丰富的有关满族文字特别是满文玺印的新资料。在满族文字方面,看到了李德启先生1931年12月发表的《满洲文字之来源及其演变》^[7]。这是我国近代满文研究的奠基之作。文中援引“史书中与满文之起源及其演进之迹有关者”与“西籍中讨论此事之文字”,融而贯之,较为详细地对满文来源进行了中肯精当的分析探索,对满文诸体演变也例举难为常人所见之珍贵资料详加论证,堪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理有据有一定分量的开创性佳作。还查到了题名为《各种文字的起源》的清代无名氏满文写本小册子,其中用不多的篇幅分题专门介绍了“西域”(回)、“西蕃”(藏)、蒙古、满洲、汉五种文字的起源,尽管内容简略,却可以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人的认识看法。

在玺印资料方面,除了上举满文及蒙文楷书合璧的“管理镶蓝旗游牧察哈尔总管之印”,还收集到因使用面极窄而只见诸记载却缘吝一面、在笔者《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再调研》一文例图中唯一阙如的满文“转宿篆”印应用代表例证。这次得到“*ulhicungga hafu samadi baksi i doron* 慧通禅师之印”^①(见图五)^{[6](P81)}资料,使我们终窥清代满文篆字具体应用实例之全貌。

清入关后,用印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文由单一满文楷字或篆字向满、汉文合璧方向转变。这是同政权统治对象由从前关外的以满族为主体向入关后的以汉族为主的转变紧密相关的。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明令“内外各衙门印信,俱并铸满汉字样”^{[8](P65)},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正式确立我国官印民族文与汉文合璧之体例。其制,满文本字(即满文楷字)在左,汉文篆字在右,满文篆字业已退出玺印。调研中,注意收集了这一时期的印例,如“*han i boobai* 皇帝之宝”(见图六。顺治元年造)、“*hafan i jurgan i doron* 吏部之印”(见图七。顺治元年造)、“*lio cio gurun i wang ni doron* 琉球国王之印”(见图八。康熙二年造)等,可以看到清初玺印中满文楷字在印中与汉文篆字合璧应用的具体面貌。满文篆字在玺印中的“复辟”则是85年以后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1] 满洲实录(《清实录》影印本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① 为排版方便,此处仅列满、汉文,藏文从略。

- [2] 朝洛蒙. 蒙文篆刻[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6.
- [3] 贾拉森. 缘起南寺[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 [4] 邹兰欣. 满文篆书简论[J]. 满语研究, 1986, (1).
- [5]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6] 欧朝贵, 其美. 西藏历代藏印[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1.
- [7] 李德启. 满洲文字之来源及其演变[J].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1, 5(6).
- [8] 图海, 等. 清世祖实录(影印本第3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责任编辑: 黄锡惠]

New Materials on Manchu Seal Characters of Qing Dynasty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Changchun, Huhehaote and Beijing*

JIN Yi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chu seal characters and the Mongolia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Manchu characters developing history and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of Manchu seal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materials, the transition reflected in the new Manchu seal characters showed its originativ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Mongolia seal characters, however, appeared earlier than Manchu, had no the same phenomena. S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ormer didn't draw lessons from the later, the two characters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respectively. The new investigated materials can give help to deepen research in Manchu characters and especially in Manchu seal characters and its use.

Key words: Manchu seal characters; Mongolia seal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new materials

《渤海的历史与文化》(第二辑)出版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作序、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刘晓东研究员主编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第二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

1991年, 延边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吉林省学者王承礼、刘振华主编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此次继之出版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第二辑)是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题项目, 共收入相关学术论文45篇。从发表时间上看, 上起1987年, 下止2002年。从文章内容看, 主要分考古和历史两大类。在考古类中又分综述、城址、墓葬、陶器、碑刻、交通及相关遗迹等6个序列; 历史类则分族源、文化归属、对外关系、经济与民俗、史料考订、书文评介等6个序列。基本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期国内渤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西离吉兰)